

放眼未来 经纬四方

——2019年度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巡礼



管,古语中有“钥匙”之意。《史记》曰“李兑管赵”,将之引申为掌控一地。理,也作雕琢玉石之所为。《韩非子》中,“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担当重任,精细治之。是为管理。在现代,管理学作为一门系统地研究管理过程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的科学,从微观到宏观,事关国计民生。从理论,到实践,管理学家步履未停。

2005年9月发起成立的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是中国人自己设立的管理学界第一个奖励基金会。宗旨是奖励中国在管理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工作者,倡导管理理论符合中国国情,并密切与实践相结合,推动中国管理学科长远发展,促进中国管理人才的成长,提高中国管理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今天,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又将启幕,

星光熠熠……2019“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获奖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纯均。2019“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院长讲座教授贾建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创力讲席教授杨百寅。2019“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获奖人: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雷军。

伴一波微澜成沧海

2019年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获奖人 赵纯均



管理学界有一句笑谈,称有位赵老师是中国高校管理学院院长的院长。这一位老师,便是中国MBA教育事业开创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二任院长赵纯均。“赵纯均老师开拓了我国MBA教育事业,推进了工商管理学科建设,在动态投入产出和决策支持系统的应用研究上做出杰出贡献,在中国管理学界引领了中国式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如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工商大学校长陈晓红所言,近半生时间里,赵纯均就像一位阔步在前的大家长,总在为中国现代管理学教育来回奔忙,陪伴并呵护着一波又一波微澜汇成沧海。实干与情怀,辛苦与付出,全都沉淀在一头霜色华发中。1986年,在维也纳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做了两年访问学者的赵纯均回到母校清华,接到新任务,调动进入清华经管学院任职。对于毕业于电机系,而后又在自动化等系任教近20年的他来说,这段与管理教育的缘分,开始得有些突然。“改善师资,调整结构,扩大规模,争取外援。”赵纯均与同仁日思夜想,拿出16个字,成为了一句至今听来依然掷地有声的口号。白重恩毫不讳言赵纯均是学院发展和中国管理学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功臣。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现任院长,他曾在就任后于一席对谈中向赵纯均取经,得到了“做院长务必要公正”的建议,深感有益。而这并非两人间的第一次交流。1999年,一群研究转型经济的学者在北京开国际会议,白重恩在其列。会议期间,赵纯均等来自清华经管学院的老师受邀与参会者进行座谈,提到如何借鉴世界最优秀经济管理学院的经验,以提升自身研究和教学质量的话题。这场座谈,最终成为了清华经管学院特聘教授项目的发端。作为富布莱特学者,赵纯均在九十年代中花了一整年时

间,在沃顿和斯隆等管理学院开展了关于美国管理教育的专题研究,相当深入地了解了世界一流管理学院的办学思路和经历,为后来打破常规成立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国际顾问委员会,争取率先获得AACSB和EQUIS两大全球管理教育顶级认证;较早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等国际顶尖商学院开展一系列实质性合作奠定了基础。在老百姓尚理不清MBA与打篮球并无关联的1991年,作为教育部批准首批试办MBA学位教育的9所高等院校之一,清华经管学院MBA开始正式对外招生。与如今的风生水起截然不同,那一年,因这一学位而来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仅15名。风起于青萍之末,此之前3年,赵纯均在1988年冬的清华大学甲所与来自其它5所高校的专家学者一同连开了两天由教育部组织的论证会。这场论证会的主题,便是MBA教育是否要在中国办。“客观的现实需要是摆在那儿的。”如今再追溯中国MBA教育的起点,被誉为中国MBA教育开创者之一的赵纯均觉得,与其细细辨析必要性及可行性,不如说一切更像是应

时势:一者,既有的干部研究生班堪为我国干部培养模式楷模,值得在汲取西方经验后改良发展;一者,1980年研究生学位制度正式确立,为发展专业学位提供了相应基础;另一者,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养一大批经济管理人才成为亟需。一桩桩一件件,皆是中国MBA教育得以繁荣的“助推器”。“有人说MBA教育是舶来品,我不喜欢听这个。”哪怕到了今日,赵纯均也忍不住纠正此类观点。在他看来,中国MBA教育的基因来自创办于1980年代初期的干部研究生班,其后才是对北美等其它国家相关人才培养模式的借鉴。让MBA教育在中国落地,一贯遵循时任国家经委主任、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袁宝华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方针,而绝不是“照着美国抄”。推动MBA联考制度的设计、实施,改进和创新便是此中例证。90年代中,国内MBA招生院校增至二十余所,学生规模已达千人,而各校招生标准却莫衷一是,并没有如GMAT成绩的参考指标。社会之上,有关MBA学生质量的质疑鹊起,引得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内部讨论声连连,最终决定,还是要设下统一“门槛”。赵纯均时任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在他的见证与参与筹划下,MBA联考于1997年正式落地。不完全类同于学术型研究生的甄别方式,这一考试更为兼顾MBA学生尤其侧重实践经历的特点,是为专业学位研究生选拔方式设计的一次本土化尝试。不止有一人评价赵纯均的眼界开阔长远。于推动中国MBA教育的过程中,在推动实施MBA教学评估、新增院校的评审和辅导,制定MBA“九五”、“十五”发展纲要,结合中国国情论证EMBA项目的可行性并建立项目建设基本规范之外,他的心里还装着百千公里外教育资源不均衡的西部。赵纯均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当过学生又做过同事,杨斌在赵纯均身旁接触多年,称他尤善于在不同的力量间寻找动态平衡,是一位“拧麻花的高手”。他一连枚举出赵纯均扮演的若干“麻花”,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有教师的培养与引进,也有争取资源的校内与校外。每一种平衡,无不是在凝结双方力量后,起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良效。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原厦门大学副校长吴世农感慨:“在每年一次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的年会和全国管理学院院长联席会议上,赵老师总能高瞻远瞩,抓住中国管理教育的关键问题,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正确处理好数量与质量间的关系,推动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到了享遐逝的年纪,赵纯均仍未放下对中国管理教育和管理学事业发展的关切,他悉心了解领域中的点滴发展,亦参与并支持着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的工作。纵然有忧心之处,面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态势及对管理学人才的广泛需求,他的态度仍倾向乐观。作为一份来自前辈的殷殷展望,他希望有人能够继续接棒,去做一些短时期内“显示度不高”的事,让好院校帮后进院校,提升整体水平。因为“成果终会体现在学生的未来成长路途上。”(陈文晔)

学术创新只为“多走半步”

2019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 贾建民



“创新是学术的推动力,更是学术的生命力。哪怕在前人基础上多走半步,都是学术进步。”这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院长讲座教授贾建民对学术创新的理解。正是凭借这种创新精神,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管理研究,追求着他的学术抱负,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贾建民一开始学的是机械学专业。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随张震教授到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管理工程硕士学位。时隔37年,贾建民回忆起与管理学的初次结缘,仍是记忆犹新。刚开始涉足管理学的贾建民并不适应。直到后来接触了一些用数学描绘管理学和经济原理的书籍,他才发现,原来管理学同样充满了数理逻辑。“数学、力学的知识储备,一直是我在后来管理研究中值得庆幸的事情。”贾建民说,数理逻辑、工科背景与管理相融合,不仅让他慢慢喜欢上管理学,更是对后期理论和模型的构建起到很大帮助。“数学思维很重要,她让我们明白获得一个结果需要什么样的假设、条件。”在贾建民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着一本厚厚的深蓝色硬皮书,A4大小、1元硬币的厚度,虽有岁月的沉淀但仍精心保存,这便是贾建民的博士毕业论文。随意翻阅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便能看到许多数学模型。“这是我学术生涯中最有创新性的工作。”谈及博士毕业论文,贾建民有些自豪,“这份论文获得了当年的博士论文名誉提名奖,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那年有800份博士论文,仅6个得这个奖;同时论文中的一个章节获得了美国运筹学会(现INFORMS)的决策分析最佳研究生论文奖。”博士论文的主题是“风险-价值

理论”,这也是贾建民最有代表性理论,不仅是人们基于风险和价值回报,如何权衡利弊的具体决策行为,并用理论和模型来预测这些行为。“例如评估一支股票,它是否具有购买的价值,不仅要看过它过去的平均回报,还有看它的波动及风险。”贾建民说,“我们的风险-价值模型可以很好的描绘不同风险偏好的人是如何定价,并做出他们的投资决策。”基于好的数学基础,贾建民擅长使用模型来分析管理问题,并通过模型推论、预测一些行为现象。他提出的风险-价值理论不但为那些通过权衡风险与价值来做决策的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模型,而且将两个过去相对分离的研究领域即感知风险与决策偏好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基于风险-价值理论还建立了多种新的决策模型。贾建民还与他的合作者把风险-价值理论应用在消费决策研究中,发展了失望与后悔模型,建立了更具有解释力的消费者价值评价和选择模型。他在决策分析和市场营销领域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包括《管理科学》、《市场科学》、《消费者研究杂志》,以及《运筹学》等多个国际顶级学术期刊。风险-价值理论、失望-后悔模型、全贝叶

斯决策模型、属性冲突……这些专业的学术概念,应用起来,便如同生活中隐藏很深却又令人豁然开朗的道理。管理需实践以成其事的,贾建民亦肝脑涂地去做,即使当中的过程远非他所想、所预计。他说“理论与实践的耦合是管理学研究的基本特征”。2005年,贾建民与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合作,结合营销模型和顾客数据,在企业层面进行了成功的运用。研究从客户数据出发,涉及寻找客户、提升客户价值、挽留可能流失的客户等各个环节,提升了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的数据管理能力与客户关系的管理能力。“跟贾建民教授的团队合作后,我们可以从量化的角度了解到什么样的客户是最有价值的客户。”原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总裁、观众安保险执行董事陈劲说,“当时我们从数据维度分析中得出白领阶层是最有价值的客户,因为高端客户不会在信用卡上借钱,而低端客户借钱还不了的风险大。这个分析在几年前互联网还不是很普及的情况下非常有价值。”贾建民从项目研究中看到了数据的价值,通过数据可以洞察甚至预测消费者的行为,这样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效益。过去十年,贾建民与多个企事业单位进行深度合作。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眼里,贾建民是个不折不扣的学术痴,“他在大数据、管理学、营销学方面均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同时治学严谨,受学生尊重与追捧。”当被问及每天的生活时,贾建民坦言,如今少了行政工作他有更多时间享受研究的乐趣。“除了上课,我平常在办公室和校园活动。有时和学生讨论交流,大部分精力可以用在研究上。”贾建民说,“当然我也有10几个研究项目同时在进,学术研究是有风险的嘛。”管理学与大数据相结合,是贾建民目前研究的重点。(吴圣雁)

穿着中山装的管理学者

2019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 杨百寅



一身平展合身的浅灰色中山装,一双传统千层底布鞋,发顶不见一丝银白,眉宇间却透着清朗,温润不失庄重,儒雅而又亲切,这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百寅给人的第一印象,这种特有的书卷气质似乎很难与他现代管理学研究者的身份相联系,但在深入了解他的学术思想与个人经历之后一切又都显得相得益彰。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刚满16岁的杨百寅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大学数学系。4年系统的数学训练不仅培养了他缜密的逻辑思维,而且直接影响了杨百寅后来的学术研究。作为人力资源领域的杰出学者,他主持开发的学习型组织理论模型和科学测量工具(Dimensions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Questionnaire, DLOQ),已被译成7种文字,并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使用。毕业分配时,杨百寅本来要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从事经济地理研究,然而,阴差阳错,最后却到了南京分院人事教育部门,且一干八年。“我对分院人特别感兴趣,喜欢思考,喜欢琢磨,尤其是研究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在说起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时,57岁的杨百寅眼中依然闪着亮光,“虽然我本科是学数学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其实对管理学更感兴趣,所以出国读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拿到美国佐治亚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后,杨百寅又先后在奥本大学、爱达荷大学任教,在明尼苏达大学,他从助理教授做起,在短短5年之内成为终身教授。也正是在北美任教期间,杨百寅初试锋芒,研究成果开始获得学界认可。他先后获得《国际》《人力资源管理评论》2003年度杰出论文,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年会1998、2003、2005年度十多项荣誉。2006年,当收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的邀请时,杨百寅毅然决定回国任教,而后出任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系主任。“我在中国长大,读完大学,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有机会出国,但一颗中国心放不下,我还是希望能够回国做贡献,同时我是家中独子,只有回来才能做到忠孝两全。”虽然久居海外16年,但于国于家,杨百寅仍然怀着一份传统文化浸润下那种朴素真挚的情感。回国工作以后,他还获得了国际人力资源开发学会“杰出学者奖”。俄亥俄州立大学职业教育培训研究中心主任雅克布斯(Ronald Jacobs)教授评论他是人力资源开发领域二至三个顶级的学者。同时,他还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多项荣誉和教学奖励,并于2012年成为国家特聘专家。现任SSCI刊源英文学术杂志《人力资源开发季刊》主编,《国际人力资源开发》《成人教育季刊》和其它多家学术期刊的编委。“管理学者的研究,带着不同的眼镜,在实践中是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也会总结出不同的东西来。”作为杨百寅多年的同事,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杨斌告诉记者,“百寅对中国管理有信仰,这使他戴上了一副非常重要的眼镜,让他能孜孜以求地发掘中国管理的一些特征与特色。”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信仰,自2006年全职回国工作以后,杨百寅一直致力于中国式管理与领导力及其思想文化基础的研究与探索,在系统地分析了不同意识形态对经济机制以及组织和管理所起的影响作用后,首次提出了中国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受到三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共同影响的学说。基于以上思想而形成的专著《定力:中国社会学变革的思想基础》于2018年9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如果说儒、释、道三家合流创造了至今令人怀念的盛唐和南宋,那么,吸纳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华也将成为民族复兴的社会。在中西结合、多元融合的基础上更注重本土化的研究是杨百寅一直坚持的治学理念,“我希望能够打通中西文化的壁垒,对中西文化本质的东西进行研究探索,同时把中国更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运用到现代社会管理中。”杨百寅说到。杨百寅深厚的学术积淀,更多源于他超乎常人的努力钻研。“我们晚上11:00从实验室回寝室,老师在办公室,我们11:15走,老师在办公室;11:30走,老师还在!”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助理教授高昂现在回忆起在杨百寅指导下的读博岁月,对老师的勤勉依然记忆犹新。“我思考的是我们中国管理学者应该既能顶天又能立地。顶天是能够跟西方最先结出的一些管理学的理论和思想进行对话与交流,立地则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践,把中国企业卓有成效的管理方式进行总结提炼。”说到讲好中国故事,杨百寅的神情含着希望,眉头却微微收紧,“关于这方面的深入探索工作,我还刚刚开展,做得好的话就能够把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概念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传播,发扬光大。”(高 媛)

顺势而为,做风口上的颠覆者

2019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获奖人 雷军



9月19日,位于北京海淀区安宁庄路的小米科技园正式开园。从中关村一间30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到科技园的8栋楼,34万平方米,52亿元的造价。“北漂”9年,小米科技增长的不仅是办公面积——今年7月,《财富》杂志公布2019年最新世界500强排行榜,小米首次上榜,排名第468位,成为最年轻的世界500强公司。移动互联网浪潮正在以一种改变与颠覆的力量席卷着当下的经济、生活,怎样顺势而为开拓新的事业?怎样让中国民营企业赶超世界步伐?小米集团就是创始人雷军给出的答案,他的互联网思维和创新产品模式正深刻影响着中国制造业发展。小米成立6年那天,雷军在微博上写到:“2010年4月6日,我和一群小伙伴,大家一起喝了碗小米粥,一家叫‘小米’的小公司就在保福寺桥银谷大厦悄然开张……”那年雷军40岁,创办小米不是他第一次创业尝试。回溯到1987年,雷军在武汉大学计算机系读大一,看完《硅谷之火》,激动得在学校操场里走了一圈又一圈,心绪久久难平。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立志做一家影响世界的伟大公司。大学毕业,雷军23岁,加盟金山公司,成为第6号员工。当时,“程序员”就是雷军梦寐以求的职业。他没日没夜地开发,每天几乎只睡四个小时,因此被称为“中关村劳模”。1998年,雷军接任金山公司总经理。2007年10月16日,金山经过几次努力终于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本是一

件值得高兴的事,但雷军却认为还应该把握住更大的机会。“98年腾讯创业,99年李彦宏创办百度,99年末阿里巴巴创业。我们坚持做办公软件,但却错过了整个互联网。”雷军说,两个月后,他以“身体原因”宣布退休。退休期间,他作为天使投资人投了不少移动互联网公司,也彻底明白了了一个道理,唯有顺势而为,才能迎头赶上。雷军调侃自己的那句话流传很广:“站在风口上,猪也能飞上天。”对他来说,创立小米时的风口在哪里?3G将开,带宽速度大大提升,这意味着智能手机的巨大市场。2011年8月16日,小米手机发布会现场,雷军身穿黑色T恤和深蓝牛仔褲,只发布了一款产品。“人家四十不惑,在顺势而为这一点上我是尤为不惑的。”雷军看准的“势”,是互联网的发展大势。

小米采取了全新的互联网售卖模式。首款手机产品问世时,没有一家线下店,没有一个线下促销人员,所有手机全部通过网络预订和发货。这开创了中国手机产业的先河,也在销量上展现出巨大成功——正式开售后5分钟,30万台小米手机被抢光。在品牌推广领域,雷军的互联网思维一以贯之。社会化媒体是小米品牌传播的主战场,雷军本人更是“亲力亲为”,化身接地气的“网红”企业家。2017年9月,在一份中国网红名字影响力排行榜中,雷军高居榜首,他也因此有了“第一网红”的称号。雷军2010年注册微博,现粉丝数已超过2000万,发微博将近10000条,从外观到性能,从价格到电池续航能力,他的微博内容几乎全都在小米公司及其生态链产品“摇旗呐喊”。

2016年4月,雷军试水直播,首秀即收获8万粉丝观众。2017年12月,为了帮小米直播拉人气,雷军亲自在平台上直播了两个半小时。“全国三千家生产插线板的公司,没有一个肯花心思把插线板做的不那么丑陋,而是都在努力拓展渠道,进行推销。”雷军认为,一个插线板成本只要20元,定价却是200元,如果整个产业都被困在低效运转的死循环里,不但产品品质上不去,消费者利益也会受损。雷军想成为一种外力,做行业乃至跨行业的颠覆者,促使传统低效行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小米创立之前,雷军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百年企业?什么样的东西使你能够做成百年企业?”他琢磨了半天,发现中国的百年企业非常少,只有三、四家,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同仁堂。“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同仁堂最为人耳熟能详的这句话启发雷军,这家“老字号”之所以能长青,得益于他们对产品的严格把控。“小米式创新,不止是小米一家公司的创新,更有可能是所有中国制造业的创新。”雷军有个小小的梦想,他希望把小米办成中国的国民企业,带动整个工业的转型升级,让中国产品甩掉劣质产品的标签,重视产品品质、设计、创新和企业经营效率,用互联网思维升级“中国制造”为“中国智造”。(综合参考《雷军:顺势而为》《改变世界:中国杰出企业管理思想访谈录第一季》及网络报道)(龚凡)